

宋代文化研究

(第三輯)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資料中心 編

95
K244.03
4
2:3

8421107

宋代文化研究

(第三辑)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编
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资料中心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3年·成都

C 070587

(川)新登字 014 号

责任编辑：陈建明

特约编辑：曾枣庄

封面设计：吴洪泽

宋代文化研究 (第三辑)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编

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资料中心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望江路 29 号)

四川省地矿局测绘队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32 开本 17.25 印张 430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册

ISBN 7-5614-0993-1/G·93 定价：18 元

目 录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纪念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曾枣庄(1)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计算机辅助古籍整理研究室(11)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十年成果目录	沈治宏编(15)
宋大礼五使系年	郭声波(34)
《西崑酬唱集》诗人年谱简编	曾枣庄(62)
徐铉行年事迹考	李文泽(98)
柳开年谱	祝尚书(113)
张方平年谱	王智勇(148)
许将历官编年	黄锦君(180)
唐庚年谱	马德富(202)
苏籀年谱	舒大刚(227)
陈康伯年谱	罗国威(255)
周必大年谱简编	沈治宏(281)
尤袤年谱	吴洪泽(308)
薛季宣年谱	杨世文(336)
余玠年谱	王晓波(362)
王直方生平探微	刘文刚(392)
朱熹岳父刘勉之事迹考	郭 齐(404)

施子美与《施氏七书讲义》.....	刘琳(422)
刘克庄交游考Ⅱ.....	向以鲜(425)

辽宋夏金元五朝研究英文资料

目录(1977—1989).....	杨世文 编译(444)
1966—1981 年台港宋代文化研究	
论著目录.....	郭声波 王蓉贵 编(470)

补 白

《宋史》订补十则(尹波撰)

德祖为林虑字(61) 昭怀刘皇后本传补(61) 成肃谢皇后卒于
开禧三年(97) 理宗谢皇后封后在绍定三年(179) 秦鲁国大长
公主生卒年(179) 汪立信为淳祐七年进士(179) 赵岷当作赵
岷(201) 洪兴祖生卒年(254) 洪迈曾知太平州(469) 林震为
崇宁二年进士(469)

本所新书预告

《宋代的隐士与文学》(刘文刚著)	(226)
《三苏选集》(曾枣庄著)	(226)
《四川历史农业地理》(郭声波著)	(361)
《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补编》(李国珍编)	(391)
本所存书:《宋代文化研究》第一~二辑.....	(421)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曾 枣 庄

(一)

今年，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已成立十年。十年来我们做了以下几件事情：首先是组织班子。十年前初成立时，杨明照、赵振铎、胡昭曦三位先生担任所长。他们申报了二十个人的编制，从文史两系聘请了一些兼职研究人员，要了六间房子，购置了一批图书。第二年，我和刘琳调到古籍整理研究所负责。由于在进人问题上的宁缺勿滥执行过严，我们到古籍所时，实际上没有一个正式人员。我们的任务首先是调人。由于学校人事处的支持，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调进了十多人，基本上成了实体。现在我们所正式人员有二十三人，含研究人员十八人，资料人员三人，行政人员二人。在研究人员中有教授三人，副研究员四人，副馆员一人，助理研究员十一人。从学历看，绝大多数都是硕士生、博士生毕业，受过专业培训；从时限看，研究先秦、魏晋、唐宋的都有；从学科看，学古汉语、文学、历史、思想史的都有；从年龄看，中青年为主，多数人才三四十岁。校人事处长说，他们为川大古籍所调的人是比较理想的。确实如此，这支队伍成了我所编纂《全宋文》比较得力的班子。

其次是定研究方向。刘琳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我是研究宋代文学的。最初我们商定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和宋代文学为重点。

但后来由于编《全宋文》，宋代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实际成了全所的重点。由于我们所多数人都是才毕业不久的研究生，整理研究古籍的经验并不丰富，我和刘琳都主张上一个大型项目来把大家团聚在一起。我主张上《全宋诗》，刘琳主张上《全宋文》，认为这样文史两方面的力量都可以用上。但编《全宋文》比编《全宋诗》难，犹豫了半年，直至1985年暑假，我才同意上《全宋文》，并得到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及其秘书处的大力支持和全国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的激励。我们在征询邓广铭先生的意见时，他就反复鼓励我们要知难而进，并说他正在编纂的《宋人文集分类目录索引》可提供给我们使用。

《全宋文》的编纂工作，大体是分为四个相互衔接的阶段进行的：1985年暑假以后，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作各项准备工作；原计划用二至三年的时间作资料普查工作，结果我们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查了近万种图书、碑刻、法帖；三是整理校点，四是编纂、审稿，这后两段实际上是同时进行的，即一面校点，就一面组织审稿。

象《全宋文》这样的大型古籍整理项目，没有通盘的规划、详尽的细则，走一步看一步，就难免返工，相互埋怨，人心涣散，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我们一开始就制定了编纂规划、普查细则、校点细则、审稿细则、资料管理细则，希望尽可能考虑得周到一些，避免大的返工；在实际工作中，常常遇到一些事先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我们又作了很多补充规定。1988年，《全宋文》第一册出版后，编纂《全宋文》的各个环节实际上都经历过了，有可能也有必要对《全宋文》的编法加以总结，以便统一《全宋文》今后的校点审稿工作。于是我们把陆续制定的各种细则和补充规定归纳为十二个问题，制定了正式的《〈全宋文〉校点审稿细则》，对作家小传、收文范围、文章标题、校勘要求、标点要求、正文出处、文章编排、行款格式、编审质量等，都作了统一规定。

《全宋文》自 1988 年开始出第一册，到现在已出至第三十册；有生年的作家，今年暑假已全部校点完毕，共编了 174 册，估计无生年、无名氏作家还可编十余册，全书在一百九十册左右；初审已审完七十余册，四千余万字；复审已审完五十余册，三千多万字；大约再花一年多时间作扫尾工作，《全宋文》的编纂任务就可全部完成。我们原计划用十到十二年的时间编完《全宋文》，所内实际是按十年安排工作的。现在看来用九年的时间即可完成《全宋文》的编纂任务。

但《全宋文》的出版进度不能令人满意。1991 年在修改《全宋文》的出版协议时，我们提出每年出二十册，争取 1998 年出齐。巴蜀书社本已同意，但在正式签协议时，新任社长却坚持要改为争取每年出二十册，保证出十册，而在内部宣布每年只出十册。按照这一进度，《全宋文》还要出十五年，即要到公元 2008 年才能出齐，成为跨世纪工程。实际上只有 1992 年因赶书展出了十册，今年无书展、评奖活动，连每年十册也不能保证。去年六月印至三十册，现在已是十一月，一年零五个月过去了，一本也未印出。这样下去，更不知道要出到何年何月。这使《全宋文》的一些扫尾工作也无法进行，如书不出齐，各种索引就无法编。这样一部大书，没有索引是不便使用的。

为加快《全宋文》的出版进度，我们曾向出版社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由出版社向省政府申请资助或贷款，改为计算机排版，每年印三四十册，争取三五年内出齐。下策是解除协议，我们另找出版社出版，条件是放弃全部版权，包括已出部份。中策是仍以巴蜀书社名义出版，但自第四十一册起，由我们自筹资金，自费出版，自负盈亏，条件是今后任由我们抽印、重印全书（含前四十册），转让版权，亦盈亏自负，与出版社无关。社长已同意按中策办，但因一副社长说，这样一部大书让编者自筹资金出版，出版社的脸往哪里放，而决定暂按上策努力。影响《全宋文》出版进度的根本原因是赔

钱,赔钱的根本原因是经营不善。三大《全》中的其他两《全》皆赚钱,只有《全宋文》赔钱。开初错误地决定分册征订,加之出版周期长,每征订一次,征订数下降一次。现在已很难改变这一被动局面,只有尽快出齐,配上索引,一次推出。我们算过细账,将来只要重印(只需付印刷费)一千至一千五百部就可收回全部成本,还清贷款,并可略有结余。

第三,围绕《全宋文》进行图书资料建设。现在全所购置图书约40000余册,除几部大型丛书外,基本上都是围绕宋代添置图书。买得到的就买,买不到的就复制或拍胶卷。我们并不要求版本齐全,但要求有关宋代的书基本上都要有,现在已大体做到了这一点。这既有利于我们编《全宋文》,又有利于全所今后长期从事宋代文化研究,形成川大古籍所的藏书特色。

第四,利用微机辅助编纂《全宋文》。我们研制了汉字四角号码自动生成软件,并用这一软件编了宋人别集目录索引、宋文作者索引、各省通志宋代人名索引等十多种索引,基本满足了我们编纂《全宋文》的需要。

第五,抓《全宋文》的附产物。《全宋文》初上马时,学术界一些朋友要我们从一开始就注意抓《全宋文》的附产物,认为《全宋文》附产物的价值未必低于《全宋文》本身。根据这一意见,我们起草了一份计划,目录类拟编《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现存宋人著述总目》、《宋人别集序跋汇编》等;传记类拟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补编》、《宋人年里表》、《宋代人名大辞典》等;索引类拟编《各省通志宋代人名索引》、《宋代题刻人名索引》、《宋元笔记人名索引》等;资料汇编类拟编《新编宋大诏令集》、《宋人碑传集》、《宋文纪事》、《宋代蜀文辑存补佚》、《宋代考证文汇编》等。我们只是提出设想,由各人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条件自由选题,也做了一些组织落实工作。现在已经出版的有《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已经发稿的有《宋人年谱集目》,已经完成即将陆续出版的有《现存宋人著述总目》、《宋人

传记资料索引补编》、《宋文纪事》、《宋人别集叙录》等。

第六，加强研究工作。古籍整理本身就是一种研究工作，但又有区别，各有所侧重。在《全宋文》的资料普查阶段，我们强调全力以赴；当资料普查基本结束后，我们就开始强调研究工作。我们要求每个研究人员定选题，定研究方向，并鼓励大家结合校点《全宋文》，多作研究工作。四川大学古籍所成立以来的十年间，除出版了《全宋文》三十册以外，还出版了专书 49 种，发表论文 285 篇。这里要说明的是，专虽出版于最近十年，但大部份都作于古籍所成立以前。由于编《全宋文》占去了大家的时间，真正完成于这几年的专著并不多。但随着《全宋文》的完成，重心逐渐转移到研究方面，个人研究成果将会渐渐多起来。此外，受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处的委托，我们同北大古文献所联合召开了国际宋代文化研究讨会，出版了《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从 1991 年起，我们所每年还出版了一集《宋代文化研究》，现已出至第三集。

（二）

编纂《全宋文》是一件辛苦、繁琐，但也值得的工作。说辛苦，当年为普查资料，奔走于全国各地，挤公共汽车，住地下室，在昏暗的灯光下整理资料的情景；在地板上、床铺上、走道里排比资料的情景；为按出版社规定的时间出版《全宋文》前几册，平时不坐班而暑假坐班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说繁琐，古籍整理本身就是一件十分繁琐的工作，象编纂《全宋文》这种大型断代总集，工作尤为繁琐。如何拟标题，如何注出处，如何统一行款格式，都要一篇一篇地进行检查。《全宋文》的史料价值远远超过文学价值，而我是研究宋代文学的，读那些毫无文学兴味的诏令、奏议、公文，而且必须逐字逐句地读，确实如同嚼蜡，苦不堪言。说值得，我们毕竟做了一件有

意义的工作,完成了一部大型断代宋文总集的编纂。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转折点,元明清各代的许多政治、经济、文化现象,都是宋代开的头。《全宋词》早已编成,随着《全宋诗》、《全宋文》的编成出齐,将大大推动宋代文、史、哲、经、科技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同时,编纂《全宋文》,也锻炼了我们所的研究人员,积累了资料,取得了经验,我相信今后我们所至少有一部份人会在宋代文化研究方面作出成绩的。

我们在《全宋文》的《前言》中说:“我们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收文力求不漏、不重、不误,体例力求谨严,作者和作者小传力求不出差错,版本力求选择足本善本,校勘力求精审,标点力求准确。”这里都限以“力求”二字,就是因为我们想尽力达到这些要求,但也清楚知道,一条我们都不可能完全做到,只能“力求”而已。在《全宋文》初上马时,我花过一些时间来研究历代编纂总集的经验教训,发现去取不当、类目不清、张冠李戴、体例不纯,几乎是历代总集的通病,大型总集尤其如此。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很有名,却被苏轼讥为“强作解事者”,更何况我辈! 1987年暑假,在成都召开《全宋文》体例审定会,我在会上发言说,将来的《全宋文》,不是错误百出,也不是错误千出,而是错误万出。当时有人说我说得过头了,其实我是算过账的。二十四史是校点一套现成的史书,错误主要在校和点两个方面,不存在漏收、重收、误收和作者的张冠李戴等问题,仅四千多万字,是组织全国的老专家校点的,现已指出的错误多达数千条;《全宋文》是新编一部大型的断代总集,出现错误的可能性比校点现成的二十四史多得多,字数比二十四史至少多一倍,参加这一工作的又主要是中青年,加之又是边整理边出书,出现万把条错误恐怕是难免的。

学术界对《全宋文》期望很高,有朋友写信对我说,象《全宋文》这样重要的项目应该白璧无瑕。我回信说,我从不期望《全宋文》白璧无瑕,只希望少一点瑕。个人精雕细刻之作,都难做到白璧

无瑕，何况是集体大型项目？集体项目的参加者不仅水平参差不齐，工作态度也很不一致。审稿工作量大，我们虽然坚持了初审、复审，但无力一一核对原文，只是有怀疑的地方才核对，稍一疏忽，就要出错。我和刘琳都不是挂名主编，我们审了每一篇稿子。我们只有不偷懒，多做苦力，尽力减少错误，做到问心无愧而已。象《全宋文》这样的大型项目，不是我们一个所的二十多个人就能做到白璧无瑕的，这要靠读者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错误，将来再版时不断订正错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渐接近白璧少瑕。

学术界对《全宋文》的批评，对的，我们就放进《全宋文》补正专柜，供以后作《全宋文》补订用；我们认为不恰当的，一般也不作答复。关于作家小传，我们要求“字数尽可能控制在二百字以内”。《全宋文》的不少作家小传，实际已超过二百字。要求象作年谱那样详列逐年仕履，显然是不恰当的。

文章标题的要求是：“所用底本有题者则用底本之题”，各本皆无题，需自拟标题者，“应尽可能用本文中的词语”。有人批评我们不当用哀册文、谥册文之类的标题，其实这是《宋会要辑稿》中的原题，可能是批评者不熟悉《宋会要辑稿》之故。

编纂《全宋文》，没有为每篇文章进行系年的任务。我们只要求：“集外文可知写作时间者，应在题下用小字注明写作时间”。这主要是指从史书中辑得的诏令、奏议，以便在诏令、奏议类中，大体按时间编排。而不同的史书往往系同一诏令、奏议于不同的年月，我们要求有据就是了，不可能要求一一考订异同，辨正是非。但对已发现的错误也作了不少订正，如王智勇对《宋大诏令集》系年之误就作了不少订正，他发表的《中华本〈宋大诏令集〉系年辨误》就是这方面的部份成果。

编纂一部大型断代总集与校点一部别集，要求应有不同。编总集的主要任务在辑佚，不在精校，我们从来认为《全宋文》的编纂代替不了对宋人别集的进一步加工整理。《全宋文》的校勘要求是：

“正确选择底本”；“篇名校对从严，以防漏收其他版本多出之文，原则上一切现存版本均应校对篇名”；“凡有多种版本的别集和有多种出处的集外文，均应通校二三种，以防底本有脱漏”；“只要底本可通，不得轻改底本，也不出异文校记”。从这些规定不难看出，我们的着眼点在辑佚文，防脱漏，不在精校。如果我们象精校别集那样要求《全宋文》，详列异文，详加考证，《全宋文》的篇幅不知还要增加多少。

《全宋文》的主要价值确实也在辑佚。为编《全宋文》，我们查了近万种资料，这是任何个人的力量所难以实现的；在近万人的作者中，含文别集仅五百余种，百分之九十五的作者无别集传世，都是辑佚得来的；《全宋文》近一亿字，一半以上是辑佚所得，如范镇文十二卷、富弼文十二卷就是辑佚得来的；即使有别集传世的作者，也补了大量的佚文，如范仲淹、宋祁、文彦博、韩琦之文，补佚都在五十篇以上，有的还在百篇以上。

我最初对是否上《全宋文》颇犹豫，主要是担心校点质量。一位老先生对我说，即使你们校点得一塌糊涂也不要紧，只要尽可能收全就行了，你们读不懂，别人读得懂。这虽是鼓励之词，不能这样要求自己、原谅自己，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全宋文》的价值所在。

(三)

今后川大古籍所的工作，主要有四项：第一，继续完成《全宋文》的扫尾工作，无生年作家文、无名氏文的校点和审完全部稿子，估计还要一年多的时间。但编制各种索引，要等到《全宋文》接近出齐时才能进行。

第二，完成《全金文献》的编纂任务。这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约我们编的一部大书。此书兼有总集和丛书的双重性质，旨在网罗存

世不多的全部金人著述，为金代文史研究工作者提供比较完整的资料。拟把全部金人的专著和单篇文章，包括经史子集、诗文词曲，都集中在一起，作为上编；把宋元明清有关金代的史料和论著也集中在一起，作为下编。已作了一些准备工作，目前已开始投入较大的力量，力争在 1997 年完成。

第三，把重点逐步转移到研究工作上。无论《全宋文》的扫尾工作还是《全金文献》的编纂任务，在三四年内就可完成，三四年后全所怎么办？今后我们不可能也不打算再申报象《全宋文》、《全金文献》那样的大型古籍整理项目，我们需要时间把编《全宋文》、《全金文献》过程中所收集的大量资料加以研究和消化。因此全所将从以整理为重点转入以研究为重点，从以集体项目为主转入以个人项目（包括三五人自由组合的项目）为主。怎样才不致于在《全宋文》、《全金文献》编完以后，全所就逐渐涣散，怎样才能继续使全所欣欣向荣，继续保持全所的研究重点和研究特色，成为名副其实的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资料中心，成为全国研究宋代文化的基地之一？这就是我们近两年考虑的中心问题。为此我们必须为全所研究宋代文化创造一些有利条件。一是成立研究室。这以前全所都在编《全宋文》，只能统一组织，无法按研究室活动。今后以个人研究为主，就可按研究室活动了。根据本所研究人员所学专业及个人兴趣，我们成立了宋代文学文献研究室、宋代史学文献研究室、宋代理学文献研究室，加上机辅研究室，共四个研究室。以后主要按研究室开展活动，每个研究室人数不多，多者七八人，少者四五人，便于商量，组织一些小型课题，作比较深入的研究。二是办好《宋代文化研究》。现在不仅出书难，对于尚未名世的中青年学者来说，发表文章也难。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每年出了一集论文集《宋代文化研究》，已经出了三集。但每集都要向出版社进贡三四千元，还是优惠。为了不向出版社进贡，我们打算改为半年刊，现在正在努力，申请刊号，还不知是否能够成功。

第四,加强微机辅助古籍整理。一是建立宋代文化资料库。《全宋文》初上马时,我们就作了这方面的试验。由于当时全力编纂《全宋文》,没有力量准备资料,没有继续进行下去,只是利用微机编《全宋文》急需的各种索引。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抽出力量建立宋代文化资料库了,我们已增置了微机,正式成立了微机辅助古籍整理研究室。我们准备用微机建立资料库,把宋人的姓名、字、号、籍贯、生卒年、进士及第年、家世、姻亲、主要仕履、著述及其存佚等二十多项输入微机,根据其中任意一项可以查出其他各项。只要准备的资料完备,不少资料输出来就可成为有用的资料书、工具书;即使不出书,也将大大方便本所的研究工作,将来甚至还可供国内外学者查询。二是建立宋代文化研究信息库,把五四以来国内外学者研究宋代文化的主要信息输入微机,使我们知道国内外有那些学者在研究宋代,他们研究的领域是什么,有些什么代表作。这既有利于我们了解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又可避免重复劳动,去研究一些他人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六月份美国哈佛大学的包弼特教授访问了川大古籍所,他说美国已在作这一工作,前一项已进行多年,后一项也已着手进行。他对我们占有的资料比较感兴趣,希望能合作把这一工作搞好。三是编宋代要籍索引。国外、港、台已编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的索引,但用的是笔划检索,查起来比较慢,可重编或改编;其他如《隆平集》、《东都事略》、《宋人碑传琬琰集》、《宋史翼》等史书以及一些重要的别集、笔记,都可系统编索引。如果能系统编出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宋代要籍索引,一定会大大促进宋代文化的研究工作。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计算机辅助古籍整理研究室

我国古籍浩如烟海，古籍整理研究任务十分艰巨。目前，国内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各个环节大多数靠人工进行，工作浩繁，往往一项规模不很大的整理研究工作就要耗费学者们的大量精力。计算机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如何利用这一现代化技术来整理古代文献，加快古籍整理研究的步伐，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定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指出：“应大力发展索引的编制工作（包括综合索引和专题索引），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在《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中又指出：“在今后十年内，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和微机汉字系统的建立，应加快古籍整理手段的现代化步伐。”因此，计算机辅助古籍整理研究是应当立即进行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从1986年开始探索利用计算机辅助进行古籍整理。经过几年研究，我们认为在古籍整理工作中，有很多环节是可以用“计算机辅助”方式进行的。我们的实践证实，这种方式可以大大节省人力，提高工作效率。1992年3月11日，我们所正式成立了“计算机辅助古籍整理研究室”。由七人组成，其中高级职称三人，中级职称三人。目前，研究室已配备微机七台，激光印字机一台（配方正排版系统），电脑打字机二台。下面谈谈我们的研究工作。

一、计算机辅助编制宋代文献索引

宋代文献浩繁,要从中查找所需资料非常困难。因此,为宋代文献编制索引是研究宋代文化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伟国先生提出了“《宋代研究系列索引》构想大纲”,从八个方面谈了编纂《宋代研究系列索引》的设想。这对整理宋代古籍,对研究宋代文化无疑会带来极大好处。但目前编纂索引主要靠手工进行,首先根据需要摘抄卡片,然后给主题词编四角号码(或笔画、拼音),再根据四角号码(或拼音、笔画)排比卡片,之后才能排版印行。工作艰巨枯燥,还容易出错。我们进行了计算机辅助编制索引的研究工作。

1、首先研制了“汉字四角号码形成软件”。利用该软件能自动标出汉字的四号码及附角号码,为了区别同码字,又增加了三位数,一共八位数,这样就区别了同码字,还确定了同码字的顺序。

2、研制了“繁简体汉字操作系统(扩充型)”。目前,计算机通用的汉字系统为国家标准一、二级汉字,只有六千七百余个,满足不了古籍整理的需要。我们和四川省电子研究所共同研制的这个系统能容纳繁体汉字一万四千个,基本上能满足古籍整理的需要。录入的文献资料能横排打印,又能将横排资料自动转为竖排打印,适合古籍竖排的需要

在以上软件的支持下,我们进行计算机辅助编纂索引的工作,研究人员不必抄录卡片,只需在文献上给主题词标上符号,计算机操作员就能按要求将所需资料录入,利用四角号码形成软件,计算机就自动给主题词生成四角号码,并自动按四角号码排序、打印,一种索引的编纂就完成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利用计算机辅助编纂了以下索引:1、《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人名四号码索引(收录宋代人名二万四千六百个)。2、《释氏疑年录》(宋代部分)人名索引。3、《宋诗纪事补遗》人名索引。4、《邵氏闻见录》人名索引。5、《全宋